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拉美研究报告

2012年第8期（总第8期）

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在接受克鲁格奖时
发表的演讲

齐峰田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ILA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拉美研究报告》

出刊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照“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要求，坚持“三大强院战略”（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着力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科研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

在实施创新工程过程中，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学术观念、选题、研究方法、组织形式、人员配置等多方面入手，全力推进对当代拉美经济社会及中拉关系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已陆续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实现了创新工程的良好开局。《拉美研究报告》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适时发布本所研究动态、传播相关研究成果、扩大学术影响力、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拉美研究报告》是本所实施创新工程的主要内部信息载体，以力求时效、简明为基本目标。其所载内容、所体现的观点均为研究者本人及其团队的初步分析和意见，欢迎读者予以反馈和指正。

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在接受克鲁格奖时发表的演讲

齐峰田译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比林顿博士（Dr. Billington）、各位嘉宾、各位巴西同事、朋友们：

今晚，站在大家面前，我感到非常激动。

获得这项久负盛名的奖项，我感到荣幸和谦卑。必须承认，我感觉有点紧张，也许是不堪重负。这听起来可能略显可笑，对一个来自巴西，曾任职总统8年，在美国、法国、拉丁美洲和自己国家的大学讲学几十年的人。但我坚持认为，这是真的。

有如此感情，部分原因在于，英语是我的第四语言，我很容易犯非常低级的错误。此外，从21岁第一堂大学讲课起，我更喜欢非正式的即席演讲而不用讲稿。这一直是巴西人的方式。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巴西图皮纳姆巴（Tupinambá）文化的土著人，每天日落时聚到一起讲故事或闲聊，一项优秀的口头传统，就这样坚持了下来。但面对今晚聚在一起的杰出人士，和赢得该奖项而为学者所设置的高标准，让我恐怕不敢如此大胆地即席发言。

虽然如此，总之我还是因这一基本事

实而深受感动，因这突如其来的荣誉而深受感动。我是第一个巴西人——也是首位拉美人——获得克鲁格奖，这是一项真正的殊荣。

曾经有段时间，就在不久前，这种荣誉简直不可想象。我花了我学术生涯中的一部分时间，研究西欧和北美国家的富裕的核心与当时称之为“外围”的——像巴西那样经济和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贫富分工似乎是一成不变的。

我仍记得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60年访问圣保罗（São Paulo）时的情形。那个年代巴西的学术界非常小，以至于电视直播对萨特采访时，会自然地观众打电话求助可以翻译的人。一位年轻的教授主动请缨，这位年轻的教授没有说完美的法语，也完全没有做到正确地传达萨特的信息……这年轻的教授就是我……幸运的是，萨特从未发现这个诡计。

在任何情况下，这都并不重要。当时巴西的学术界相当小，主要与法国有联系。对于我们来说，来自“第一世界”受

人尊敬的哲学家会花时间拜访像我们这样的外围国家——这就足够了。我们感到既惊讶又高兴。

五十多年过去了。巴西已发生巨大变化，世界亦是如此。目前巴西是世界排名第六大经济体，比英国或意大利大，正接近法国。虽然我国仍然遭受很多问题和不公正，但它在许多领域已经领先。事实上，世界经济的活力现在已逐步依赖于以前的“外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同时，我们一度所谓的“核心”正陷入一个看似永恒的危机，前途未卜。我必须承认，我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从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全球秩序的倒置会有可能发生。

相比之下，在我们的时代，所谓的“新兴世界”的大学正在不断成长和提高，在研究、创新和商业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事实上，我确信将会有更多新兴国家的学者赢得克鲁格奖。这种全球权力的转移必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之一。

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巴西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是如何克服各自的许多问题，并导致了一个新秩序？一个出生在里约热内卢、在大萧条中陷入贫困和绝大多数文盲国家的社会学教授，今晚是怎样站到大家面前——站在美国国会神圣的殿堂里？

今晚在此我不能给出一个全面的解释，我主要集中谈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不论是作为总统校长还是教授，希望你能谅解。我即将进入我人生的第九个十年，发现知识和记忆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

清，要一个人说清楚真正的新生事物更加困难。然而我希望，也许通过告诉大家一些我自己的故事，会反射出别人的经历、巴西和其他国家的经历——一个更广泛、更重要的故事。正如古人所说，这是你自己的事（*De te fabula narratur*）。

多年来，许多智者都谈到那些尝试政治家和学术界的双重职业者所面临的困难。关于这两种条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写出了令人钦佩的散文。作为总统，当我需要解释一个或另一个政治决定时，我本人就求助于那种行之有效的公职人员的责任伦理与祭司、先知和教授们的绝对、最终价值伦理之间的二分法。有人说，这种二分法的调和需要一个“魔鬼的契约”。这一直给我一种夸张的印象。但我的经历，在许多方面，深深植根于相同的价值观和实践——理性与情感之间的选择。

不过，当初我的选择挺简单。不是选择既定的路径学习法律或文学，而是去了圣保罗大学学习社会学。说实话，我并没有真正了解我学的东西，我怀疑我的同学也是如此。我们学习是要成为社会学家……我认为我们真的想成为社会主义者，（暂停），但当时我只有17岁，我想改变这个世界……或者更谦虚地说，我想改善巴西人的生活。

有如此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巴西仍然是深深植根于它的过去，一个曾经的欧洲帝国的殖民地和所在地——曾经进口10倍于美国的奴隶，直到1888年才取消了这种令人憎恶做法的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开始上大学时，巴西有超过一半的

人口患有慢性营养不良症，买不起鞋子。只有1/3的孩子上得起学。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一半的婴儿活不到他们的第一个生日。巴西人平均寿命只有46岁，相比美国则为69岁。这是一个极端贫困、不公正的国家。

我出生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的一个中上阶层家庭。和祖父一样，我的父亲是一位将军，许多祖辈也都供职于帝国和共和国政府。当我还是个孩子时，里约热内卢就是巴西的首府，中产阶级在那儿保留着与世隔绝的小特权。我记得在科帕卡巴纳海滩（Copacabana Beach）上上体育课，慢跑到青翠的山丘上俯瞰全城，依然大多是免费的贫民区——棚户区，不久就成为了风景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而到我上大学时，巴西已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我的愿望、我的价值观都反映了这些变化中的环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西加入盟军时主张平等的冲动，为我们的发展和民主化创造了独特动力。在欧洲为民主而战和献身的巴西军人知道，他们可以不再捍卫国内的不平等独裁。

不平等和欠发达是我开始学业时的重点。但必须承认，直到经过一段时间，我才明白我的社会和政治关注与我正接受的学术构成之间的联系。如果笛卡尔（Descartes）——其工作就是由来自法兰西学院的教授用法语教我们——可以相当容易地被吸收的话，那么康德（Kant）的先验原则更难理解。在涂尔干（Durkheim）的《社会学方

法的规则》（*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中，我清晰地找到了笛卡尔的主张。我执着于，尤其我的愿望——即便在当时——就是要找到学术实践和现实世界活动之间的联系。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韦伯的著作——在他“有目的的行动”中，在他对各种统治形式的描述中，或者在他与平庸官僚抗衡的超凡魅力中，我看到了我生命中期待的第一缕闪烁。

我充满激情地阅读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与《自由、权力和民主设计》（*Freedom, Power and Democratic Planning*）。“伟大的理论”的诱惑，并没有妨碍我寻找实证的社区研究以及帕森斯（Parsons）和默顿（Merton）所规定的功能主义方法。

我也受到那些致力于了解社会互动基础的作者的影响，包括他们的道德结构或价值维度。以系统或纯粹结构分析为基础，没有人际交往动力的伟大的理论建设，其隐藏远比被揭露得多。在与韦伯的对话中，滕尼斯（Tönnies）强调没有人类就不会采取行动是可能的。人们或通过分享社区生活的共同经验，或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契约关系进行联系。在滕尼斯看来，社区和社会是社交活动的基本形式。

事实上，我们研究的所有理论都围绕在那些相对简单的问题上：定义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形式和机制是什么？产生什么形式的社会凝聚力？这些相互作用会在什么样的结构中发生？如何证明——并使之合法化——外部决定通过哪种进程施加给个体？

最终，是马克思（Marx），托克维尔（Tocqueville）、曼海姆和熊彼特（Schumpeter）等作家，以及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之间的结构转型，巩固了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视野。结构基本上能解释社会，但不足以说明变化。不考虑价值启发人的行动，我们就无法解释历史进程的动态。从这些多源中汲取给养，我逐渐锻造出后来被称为“历史结构”的方法。结构为人类行动提供了可能性的场所，但它只是由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驱动，去创造改变机会的个人、组织和阶层的意愿。

这就是社会学是一门人类学的原因。或者，如果喜欢，如古代所说，是一门伦理学。

这种视野将我的学术训练与促进变化和影响现实的推动力联接起来。这些问题、这些我的学术指导的产物，成为后来我所做的一切的基础。他们为我提供的工具，使我们许多人以我们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敢于进入世界尝试，一步一步地，来剥除巴西不平等的顽固的外衣。

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第一份工作，是有关巴西的永恒问题——种族问题。20世纪50年代，官方的说法是巴西实行的是种族民主，尽管我们曾有过奴役史，然而国家并没有过肤色上的歧视，真的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官方隔离。但是每个巴西人都很清楚，肤色越深意味着就越贫困。不断出现在巴西城市里的贫民区——在里约热内卢那些青翠的山丘上以及由非洲裔人所控制的其他地方，这些社区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入学、医疗，或更广泛的经济条件。因此，种族民主的神话其实相当普遍。它

掩盖了现实，但矛盾也表达出接受更加宽容的种族关系的愿望。

我们着手去揭露这个神话。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实证。在我的导师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Florestan Fernandes）教授的指导下，我们涉足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这个贫困的南部邻州——一个奴隶制并没有根深蒂固的地区，因此结果显而易见。那一定是个奇怪的景象——我们这些年轻的白人男人问巴西的黑人如何与白人相互合作的尖锐问题。我们可交谈的人唾手可得，但我们所收集的数据却是一文不值。可能无疑的是，奴隶制遗产将继续影响巴西的不平等。

在我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和巴西南部的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 in Southern Brazil）中，我努力尝试研究了有关主人和奴隶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历史结构。为理解这一点，我考虑到了制约它的大致原因，也就是说，是全球范围内的商业资本主义的运作。不过，我也要强调的是，当时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只能被理解为他们是否同时被包括在巴西殖民社会的特定动态中，而这个社会不是仅有的一个国际生产体系的延伸。

随后几年中，我的研究课题有所变化，但目标从没改变：我想了解巴西在当代发生了什么，我想摧毁神话并揭露出事实——有关“左”的和“右”的。

这些神话之一，就是假定一个进步的企业家和工人阶级间的潜在联盟去反对由农业地主和外国利益组成的阻碍者。我在《工业企业家和巴西的经济发展》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razil*)一书中的研究表明,这种解释是一个纯粹的幻想。

在1964年反对土地和其他结构性改革的呼吁中,大多数商人通过支持军事政变来阻止所谓的民粹主义的颠覆。

作为镇压浪潮的一部分,我与我的家人被迫离开我的国家。我们搬到智利的圣地亚哥,当时南美洲的自由天堂。当时到处都处于政治激进主义的时代。处在冷战高峰的古巴革命,导致了革命运动和军事镇压之间的极端对立。

在此框架内,一种解释拉丁美洲的不发达的理论流行起来。所谓的外围被核心的富裕国家宣布为永久的顺从国家。这种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完全的决裂——一场全球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秩序。

与同事恩佐·法莱托(Enzo Faletto),我们合著了一本《拉丁美洲的依附性及发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描述了一个更为复杂和活力的世界。全书以拉美经委会(ECLAC)的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和其他思想家的经济分析开始,我们意识到,外围远未是均匀的和静态的,我们强调社会阶级的、国家的历史形成,还有与世界市场的不同联系。这些差异为人类可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替代形式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为永久落后所谴责,而面临的挑战是,怎样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克服结构性障碍。

在今天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在当时它被认为是异端邪说。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是第一批谈论国内市场的国际化的人士之一。回想起来,这个过程正处于后来为人所知的“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它始于70年代,拓展到90年代的金融市场,已包括全球生产体系,远远超出国内市场的国际化。这股力量,以及政府正确驾驭它的能力,若干年后在决定金砖国家(BRICS)的崛起中,将是完全关键性的。

1964~1968年,我和家人居住在国外。经过在智利工作,并在巴黎大学任教后,1968年10月我回到巴西。当时的民主压力似乎要一定程度地开放自由空间。再次是幻想。1968年12月,军事强硬派发动政变,导致酷刑和镇压再次出现。我被军人剥夺了教授身份并被迫提前退休——那时仅有37岁。

很多人担心我的人身安全,敦促我再次离开巴西。针对非常困难的日子,我决定留下来抵抗,以尽最大努力来保持批判性思维的空间。这项决定不是没有风险,我的工作经常被审查,在圣保罗其中一个最臭名昭著的酷刑中心里,我不得不忍受长时间的质询,许多朋友和同事不得不为此支付更多的代价。

但是和许多其他民间社团一起,我们设法推行了一项为期10年的恢复巴西自由和民主的斗争。我们成立了一个独立智囊——CEBRAP(巴西计划分析研究中心)——成为欧洲中世纪修道院里保持燃烧着的抵抗的火焰。

我发表的公开批评专制政权的第一批书之一就是《威权与民主》(*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cy*)。

独裁专政谈到了“巴西奇迹”，但这些少得多的进步远不能满足眼球。CEBRAP出版了一本书叫《圣保罗：增长和贫困》（*Sao Paulo: Growth and Poverty*）。该书表明，在所谓的奇迹年份，巴西人口的80%实际收入遭遇了下降。这是一个专制制度的产物，只使社会的一小比例的人受益。在这种体制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体验到真正的进步。

我设想以致力于大众民主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参与到政治生活中。1978年，我代表反对党参选参议员，并当选为圣保罗州副参议员。1983年，我成为参议员直至当选总统。1988年，我帮助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PSDB，巴西社会民主党）。

这种政治参与意味着一种“魔鬼的契约”吗？不，事实并非如此。它意味着摒弃了我的原则或是我从事的学术工作了吗？恰恰相反。政治工作需要一种能力，能明确诊断巴西问题，了解可影响其变化的结构，并准确地估计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社会学家的的工作。在此意义上，学者和政治家——理性与情感——不仅互补，而且都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20世纪90年代中、早期就出现需要一个社会学家技能的状况，那么巴西就已可能遭遇一片混乱了。

我们国家正处在危机中。虽然巴西最近回归民主，但过渡是困难的。我们的第一任民选总统不幸在刚要就职前去世；第二任因有疑云被弹劾。同时，我们的经济遭受到了多年的管理不善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累积效应。也许最明显的症状就是通货膨胀——1993年超过2500%。过去

八年中，巴西经历了七次货币贬值。人们使用像“废人”和“贱民”来形容我们的国家。这也许是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那句令人遗憾的谚语“巴西——永恒的未来之国”听到最多的时期。

当时我担任外长，一天深夜，伊塔马尔·佛朗哥（Itamar Franco）总统在纽约打电话给我，要我担任财政部长，我在恐惧中退缩了。我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我担心这项职位将宣判我的政治死刑。我告诉伊塔马尔说我很荣幸，但最好不要再更换财政部长，这本已是七个月内的第四任了，然后我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就开始接到记者向我祝贺履行新职的电话——访问我作为财政部长的第一个决定。

我知道，由于政治和道义上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面对通货膨胀了。通货膨胀的真相是，它损害了大多数穷人的利益——使社会大多数不能获救、投资或开展计划，因此它延续了不平等。

我们决定引入另一种叫做“雷亚尔”（real）的新货币来解决问题。计划本身由在金融工程方面成绩辉煌的年轻经济学家编制。我的贡献更多的与计划提交方式，以及保证在国会和社会上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有关。以前曾试图依赖惊喜、秘密引入新货币，来试图减缓螺旋式的通货膨胀，但都失败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知道，在开放的社会，信心和技术能力一样重要。领导和社会之间的交流与正实施的政策质量一样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在雷亚尔发行前，我就提前几个月向巴西公众煞费苦心地解释我们的逻辑及计

划。我深信，这种透明度是我们成功的决定因素。

到1995年，通货膨胀率由1993年的超过2 500%下降到仅有5%。对巴西社会的影响是及时的和深刻的。生活在赤贫状态的人，现在可以保留自己的钱币的价值，购买像酸奶和鸡肉一样的基本品，其他拥有更大收入的人，现在可以存下来第一次购买电视和汽车。这是一项非常鲜明的政策，既能创造财富，又能减少不平等。这就是1994年10月我在首轮总统投票中以多数票当选的原因。

在我连续两届总统的任期中，我们采取了其他许多步骤来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和平等的巴西。我们实施了补偿政策来解决不平等，包括种族的的不平等，那是许多年前我曾做过记录的。我们执行了进步政策，进行艾滋病预防和土地分配，以解决社会最贫困成员的需求。我们坚定地推动普及教育和卫生保健。我们寻求壮大经济，通过打破垄断和某些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不放弃国家作为经济主体的必要作用，在促进发展、诸如石油和财政的一些战略领域中都发挥了直接作用。

我亲爱的已故妻子露丝(Ruth)，在自己的学术造诣内，成立了一个称之为“社区团结”(Comunidade Solidária)的项目，打破传统资助的社会程序，重点从仅仅满足生活必需品转向加强人们和社区的联系。

雷亚尔计划，这项奉行开放经济、消减贫困和不平等的政策被不同政党领导下的继任政府所承继，表明了围绕一个共同点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

一路走来，我们难免犯些错误。然而，所走过的相关这些，都使巴西利用了20世纪60年代我们已经开始察觉到的积极力量。柏林墙的倒塌加速了全球化，并引起了全球前所未有的财富创造浪潮。通过稳定经济，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决策者支持的政治共识，解决我们最贫困者的需求，我们能够保证巴西充分利用好这股巨大的力量。

今天放眼全球，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在许多方面我都比较熟悉。在一些国家，包括以前的一些“核心”国家，严重的不平等已使进步致瘫，其他国家仍然面临着一小撮精英的暴政，拒绝放手权力，继续控制财富和特权。

经验教会我要乐观。巴西的例子表明，即使是被视为“不可救药”的国家也可以迅速地扭转其命运。另外，还有新的结构和工具提供给我们进行社会变革，这些比我60年前第一次在圣保罗大学所学的更为深远，也更为直接。在某些方面，一直是经常遇到这些诸如人类和社区的概念。

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和民族国家自身已不再证明忙于影响全人类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的主动者的多样性。正如阿兰·特莱尼(Alain Touraine)概述的那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各种全球性的社会运动仅表示了人类的一个视点。

个性和社区的新形式正在重建，而不一定意味着面对面的关系。社会化媒体，如Facebook和Twitter在整顿社会变革，促使现有社会结构破裂中的积极作用，如在“阿拉伯之春”案例中，以及在

曼努埃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的其他文献中，已经有据可查。这好像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卢梭 (Rousseau) 和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的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以便为未来的综合，或至少达成体制秩序和自发运动之间的调节。

我不知道这种关系在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很显然，一些旧观念现在已不足以了解当今世界。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反对经典的经验教训或社会科学方法，这远非如此。今晚杰出人士聚集在此，就是庆祝人文在我们当今世界可以发挥伟大而重要的作用——在政治，学术以及更广泛的人类思维方面。

我希望人们看看巴西的经历，认识到宽容和多样性的重要性。我刚才提到的“种族民主”概念既是一个神话，也是一种真诚希望其实现的表达。今天，多亏补偿性的社会政策和趋向更大民主化的压力，结合缺乏大文化的分歧，而呈现一种接受分歧，甚至容忍冲突的增长趋势。这种态度，作为过去精英之间一种固定的政治调解的证据受到强烈批评，但现在则承载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含义。

我认为，目前正进行的权力转移，意味着西方世界为确保其持续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必须变得更能接受和对其他国家文化的包容性。巴西的故事展示了一个多元

化的国家是如何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经济全球化以及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把接受市场作为调节力，不能成为一种束缚。文化替代总会有其存在的空间，因为国家道德与行为将避免这个世界变得平坦和乏味。希望巴西凭借其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建设一个不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且促进国家幸福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中，可成为一味活性剂。也许在促进本次辩论中我已发挥出自己一小部分的作用。

就我来说，我将继续保持活跃，重点已不在日复一日的巴西政治上，我已放弃并离开了总统职位，而是在国际问题上，如民主的全球治理、金融秩序的重建以及国际毒品政策。近年来我已经失去了许多亲人，其中包括我亲爱的露丝。这一直很难，它提醒我们，时光流逝，很快只有历史评判我们。然而，我继续尽力做我的一小部分，仍然依靠那些储备的理智和情感。

今晚站在大家面前，也许二分法有所失衡。正如我发言中一开始所说，在这一刻，我感觉非常强烈。我觉得真的不堪重负——感激的不堪重负——感谢我的祖国，感谢这个机构，并感谢你们所有的人……使今晚成为可能。谢谢你们授予我这项伟大的荣誉，非常地感谢你。

原文出处：<http://www.loc.gov/loc/kluge/prize/cardoso-speech.html>。

译者简介

齐峰田，男，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墨西哥 UNAM 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与拉美外交关系、非传统安全问题、哥伦比亚问题以及古巴问题等。发表的主要论文有：《第二届布什政府对拉美的政策》《奥巴马当选后美国与古巴关系走向》《美国对哥伦比亚的政策》《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的现状与前景》等。

拉丁美洲研究所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于 1961 年 7 月 4 日，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64 年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1981 年 1 月起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建制。

拉丁美洲研究所是国内长期从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综合性研究的大型专业机构，研究领域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文化以及该地区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并为此设有经济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社会文化研究室、国际关系研究室、综合理论研究室（马克思主义与拉美问题研究室）。该所还设有《拉丁美洲研究》杂志编辑部、文献信息室及行政办公室。

电子刊下载说明

《拉美研究报告》此前各期均可从拉丁美洲研究所主页（<http://ilas.cass.cn>）的“拉丁美洲研究所创新工程专题报道”栏目下载。欢迎各界同仁将此链接转发给相关领域人士。如需引用，请注明文章出处。如需订阅或退订《拉美研究报告》，请发送电子邮件至：kyc_lms@cass.org.cn。

拉美研究报告（2012年第8期）

●卡多佐的演讲

2012年7月10日，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接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奖（Kluge Prize），以表彰他在人文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终身成就。卡多佐在演讲中回顾了其一生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探索与认知，并对其从政期间通过理论认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推动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作了介绍。通过阅读这个演讲稿，读者可看到巴西制定和实施雷亚尔计划（Plano Real）、解决通货膨胀、消除贫困、实现种族平等历史进程，从中也可看到卡多佐的历史贡献。组委会称，卡多佐获奖是因其对巴西经济及种族关系的深入研究，对巴西经济的转轨做出了卓越贡献。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H.比灵顿（James.H.Billington）说：“他运用了现代社会科学的不同方法加以表达，并一直保持着人道主义的透视法。”参见：<http://www.loc.gov/today/pr/2012/12-098.html>。

●卡多佐的贡献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1931年6月18日——），巴西社会学家和政治家。1953年圣保罗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国内外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1983年当选参议员，1987年参与创建社会民主党。1992~1993年先后出任巴西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1995年1月~2002年12月任巴西总统。他是拉丁美洲依附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参与者，曾撰写或合作撰写超过23部学术著作和116篇学术文章。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实施调整经济结构的“雷亚尔计划”，成功遏制住巴西的通货膨胀。卡多佐对巴西的社会结构、经济和种族关系的学术分析，为其作为总统领导巴西从一个高通胀的军事独裁国家，转型为一个充满活力、更具包容性的民主以及经济强劲增长的国家奠定了智力基础。参见：<http://www.loc.gov/today/pr/2012/12-098.html>。

●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奖

克鲁格奖又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捐资人、美国都市新闻公司（Metromedia）创始者、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John W.Kluge, 1914年9月21日-2010年9月7日）资助，2003年设立，每年奖金总额100万美元。获奖对象为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做出重大贡献且具有深远影响的人士，学科包括历史学、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艺术、语言学以及人文学科的批评等。该奖项具有国际性，获奖者不论国籍和语言，获奖主要标准是获奖者对人文科学的深入的智力成就，有“人文科学的诺贝尔奖”之称。参见：<http://www.loc.gov/about/awardshonors/klugeprize.html>。

拉美研究报告

主 编：郑秉文
学术秘书：刘东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东院
邮 编：100007
电 话：010-64039022
传 真：010-64014011
编 校：知识产权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排 版：智兴设计室·张国仓
印制时间：2012年9月10日